

导读

[英] 鲁惟一主编
李学勤等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当代汉学家
论著译丛

中国古代典籍



Z838
L824

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
中国古代典籍

导读

[英] 鲁惟一主编
李学勤等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版权合同登记

图字：06—1996—4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典籍导读/[英]鲁惟一(Loewe, M.)主编;李学勤等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12

(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

ISBN 7-5382-4724-6

I. 中… II. ①鲁… ②李… III. 中国-古代史-秦汉时代-史籍-注释 IV. K232.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1267 号

出版发行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编: 110001)

学术策划/李学勤 葛兆光

策划编辑/俞晓群

责任编辑/王越男

封面设计/王建纲

责任校对/马 慧

印 制 者/沈阳新华印刷厂

经 销 者/辽宁省新华书店

版 次/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453

印 张/18.5 插页/4

印 数/1—4,000

定 价/33.00 元

《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编辑说明

“汉学”(Sinology)是研究中国历史、思想、文化与语言的一门学问,在当今世界上,它已经发展成为成熟而且普遍的学科,从欧美到东亚的日本、韩国以及澳洲,都有不少出色的汉学专家。由于知识背景的差异和研究思路的不同,他们的论著与中国本土的学术有相当的歧异,也完全可以互相补充与启发。

近年来,域外的汉学著作已有相当多的翻译出版,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影响,但由于目前所见译著多为原作者发表于较早年代的著作,在时间上未免与当下有一段差距,使今天的中国学者仿佛总是在与昨天的外国学者对话,因此,《译丛》将着力于介绍最近的域外汉学成果,主要收录目前尚活跃在学术界的国外汉学家著作。

《译丛》收录的外国汉学家著作,著述形式不限,有个人专著、自选集,也有由多人合作完成的学术专集,等等。

《译丛》尊重原作者的版权,所有翻译出版的汉学论著均经过原作者授权。

《译丛》的编辑工作由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承担,承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恳请各方面学者给以协助与指教。

1996年10月

中译本序

英国剑桥大学著名汉学家鲁惟一博士主编的《中国古代典籍导读》，是1993年由古代中国研究会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东亚研究所出版的，在西方已经甚为风行。

本书问世之时，即承作者寄赠一部。我读后感到，这部书虽然是为英语读者指点门径，由于书中比较详尽地论述中国古代各种典籍，并介绍西方及日本研究这些典籍的成果，对于中国读者也会有很大裨益。因此，我曾写有一篇书评，刊登在《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11期上（后收入《国际汉学著作提要》一书，该书作为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专刊第一种，由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出版）。

就在1994年的11月，我应邀到美国芝加哥，参加关于编著《剑桥中国先秦史》的会议，见到鲁惟一博士，向他提出把《中国古代典籍导读》译成中文的建议，他欣然赞同；随后又和负责古代中国研究会的芝加哥大学夏含夷教授商谈，也得到允诺。不久，我便接获夏含夷教授正式表示同意的信件。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和酝酿，翻译工作在1995年夏天开始进行。必须说，《中国古代典籍导读》是很不容易译的，这部书学术性强，而且除英语之外，还涉及许多其他语言的论著。译这样的书，既需要有外语的技能，又需要有中国文献的素养，参加翻译的

各位青年学者,不畏艰难,投入了巨大的精力,终能成稿,使我感到十分欣慰。使我们十分感激的是,鲁惟一博士用了很长的时间,仔细审读了译本全稿,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意见。

这里还特别要提到的是清华大学的程钢先生,他对全书译文的认真核校,解决了我们翻译中的许多疑难,使现在的译文减少了很多错误。当然,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一译本,仍存在若干不理想的地方。例如书中述及的西方汉学家,有的未能检出其习用的中文名字;一些港台或日本的出版社以罗马化拼写,暂时没有查到原名。这样的问题,只好等待今后重版时补救了。

辽宁教育出版社惠允出版这部书,并将之列为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编辑的《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第一种。出版社各位先生对国际汉学研究给以这样的大力帮助,是我们深为感谢的。

李学勤

1996年8月23日夜

序

这一合作项目,始于在英国剑桥米尔·兰恩演讲厅一次讲座前与吉德炜的谈话。我们感慨没有一本提供基本知识的参考书可以推荐给学生,作为学习中国古代文献的案头之助,使他们能够解决从学之初所面临的某些显而易见的、不可回避的问题,并能熟悉尚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们心目中的这部书,应介绍已成定说的结论,概述古籍的内容,讨论其构成年代,并说明其作者与真伪问题。

我们认为,清楚地说明哪些部分可疑或已知为后人添纂,列出其最为重要的传统的和现代的注释者,通过较为重要的版本以考鉴其文献源流,举出最有用的西文译本与某些日本版本,辨明主要的研究工具书——包括词语索引和逐字索引,这是可能的,也是有价值的。尽管这本书从未打算成为争鸣新说的论坛,但是我们希望撰稿人能够注意新发现的材料,诸如那些需要被重新认识、进而要求修正现存观点的写本。

为使这部必备之书合情合理地迅速完成,我们决定邀请对某一特定文献已有专门研究的学者撰稿,以合作成篇。我们的邀请得到许多学者的积极响应。最应称赞的是那些即时交稿的学者,他们在以后的几年中,对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难以避免的长期耽搁,没有表现出丝毫不耐烦。这种耽搁,主要是因为确定一位在研究经验与专业知识上都是某一特定文献的专家难乎其难。解决这

一问题的任务,就落在编辑的肩上,包括承担初期工作的鲍则岳。然而,由于他们大都是高校教师,有自己的正常工作。每一年,没有一位编辑可以尽情地奉献出充分的时间给这种远非在有限的时间内可以完成的、需要全神贯注的研究工作。在此,我们感谢夏含夷教授知难而上、承担了部分此类工作的高尚行为。极为遗憾的是,波柯拉和葛瑞汉这两位撰稿人,未能看见自己作品的发表。

着手之初,必须确定本书所收文献的范围。于是,我们决定只收那些文献的主体被公认为在汉末以前已经成型为今本的作品。这一决定是出于设定一个界限的需要而从某种方便的角度所作出的随意的选择,并不是出于文学的、哲学的或历史的考虑。这种决定,没有一个能够完全令人满意。读者自己就能发现某些作品未被收入。如《后汉书》毫无疑问有着充分的理由被收入,但它完全晚于既定的截止年代。与此同时,完成于截止期前的所有现存作品,也不可能悉数纳入。仅仅以佚文形式存世的作品,虽未全收,也收入了一些。这分别取决于作品自身的价值。编者感到满意的是,有可能兼顾了夏含夷教授更可能是玩笑而非认真的意见:所收文献最合适的数目,应该是六十四。

除了总体上的指导以外,每部作品的处理,留交撰稿人定夺。每一部文献都有自己的问题与专业细节,其可能的讨论形式,根据文献本身的难度、它所引起的学术研究的程度,以及结论的确定程度,相应地广有变化。在这一方面,某些反常现象会立即显而易见。读者们会注意到这样的情形:一部在中国文学中占有突出地位的作品,这里却受到较小的关注;另一方面,一些远非广为人知、在中国文学与学术传统中影响不甚显著的作品,却享有相对较长的篇幅。

这种反差是可以理解的。举一个明显的例子。《诗经》的注释,千百年来已是往复不已、汗牛充栋。要在本书的范围内公正地概括其成果,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在许多西方文献中寻找其主要的

结论,并非过于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本书的条目,则限于指出有关这一问题的少数最重要文献中的主要参考资料。与此相反,对于那些不涉及冷僻的专业书就无法研究,或者由于写本的发现或新研究的完成而出现了新情况的作品,理所当然地给予了更多的篇幅与详细的讨论。为经籍确定年代,在读者希望找见的范围内,并不总是可能的;在这方面,撰稿人往往宁愿失之于谨慎。

决没有一个条目声称提供了有关所讨论作品全部出版物的完整目录。也不可能在这一研究阶段对所讨论的全部作品都进行文献学的研究。本书虽然希望提供了基本的参考资料,但读者们仍要查阅所列的某些二次文献中的参考文献与书目,它们会告诉读者本书可能未列的某些更新的文献。有些撰稿人可能以为读者会主动查检那些他们应该熟悉的著名文献,诸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伪书通考》、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或严灵峰卷帙浩繁的经子丛书集成。提示读者所论古籍的引文出于哪部集子或丛书,同样被认为是不必要的,除非这些引文与所论的问题关系密切。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以注释的形式,补充说明部分篇章初稿写成之后才问世的一些重要出版物。遗憾的是,不能更多地收入俄国近年来的研究成果。

每一部文献的处理,当然是自成一体的。撰稿人可以自由地按照他们认为是恰当的方式进行分篇与选择小标题。虽然希望讨论每部文献的相同的基本问题,但本书从来没有以损害行文的清晰和作者个人的偏好为代价,强求处理方式的统一或要求格式本身的一致。特别是选择列举二次文献的方式,可能会因篇而异;有些作者倾向于在正文中完整地注出参考文献,有些作者则选择另附文目的方式。这些目录因其所宜,或以年代、或以字母为序列出;在少数情况下,有必要按作者和出版年代查阅二次文献。

本书不是为汉学研究的新手设计的,而主要是面向那些完成了三四年的基本训练课程,因而熟悉中国文学与历史传统的基本

进程的研究者。所以,诸如主要王朝的年代之类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没有必要收入的。大部分情况下,我们认为不需要或没必要重复那些现成的资料;例如作品的篇名,它们可以在目录上一查即得。本书中,它们只在有问题时才加以说明。

本书最好同被研究文献的三种本子结合起来使用:一种应该是出自传统版本的最佳本,一种应该是有影响的、使用繁体字的现代标点本,第三种应该出自一种日本版的丛书。读者们仍需查阅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的刘殿爵教授的《逐字索引》中的文献注释。

我要感谢许多同事,这些年来,他们的鼓励与建议是难以估价的。特别是鲍则岳,他在最初几年的工作中,承担了合作编辑的责任。我感谢伯梯·郎德尔博士对一个条目有价值的订正,以及考尼基博士对错综复杂的日文姓名与参考文献的指点。我高兴地对芝加哥约瑟夫·瑞金斯坦图书馆东亚部和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深切的谢意。最重要的是,本书在最后阶段所以可能迅速地完付样准备,是由于夏含夷教授的积极精神与芝加哥大学蔡芳沛、玛格纳斯·菲斯克、阿米·梅耶和劳拉·斯考塞的具体支持。没有大卫·古德里奇的专业建议与熟练帮助,本书永远无法成为目前的样子。

本书体例如下:^①

一、中国和日本学者的姓名,除非有着实质性意义,否则不标明字、号。

二、在 20 世纪以前写作的中国和日本学者,于每一条目第一

① 译注:原本所列例则十条,大部分与中文译本的行文及阅读无甚关联,如繁体字的使用、汉字的罗马化、“卷”、“篇”、“章”在英译时的区别,等等;有些也无法汉译,如 Ch'un ch'iu with Spring and Autumn,汉译后无区别可言,俱作“春秋”,故从例三以下,皆予删略。原例五说明的是:《二十四史》的版本如未加注均指中华书局 1959 年后的标点本,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次出现时给出其年代(有时只是一个大致的说明,如“明代”)。这一内容在索引中重复出现。索引并收更为晚近的学者能被确定的这一类细节。这些年代,有些见录于近年日本的出版物,否则即取于下列资料:

1. 恒慕义:《清代中国名人传》,两卷本,1943年。
2. 吴德明编:《宋代文献》,创始于白乐日,1978年。
3. 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香港(重印):文史出版社,1961年。
4. 昌彼得、王德毅、程元敏、侯俊德:《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六卷本;台北:鼎文书局,1974-1976年。
5. 王德毅、李荣村、潘柏澄:《元人传记资料索引》,五卷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1982年。
6. 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三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7. 《国立国会图书馆著者名典据录》,四卷本;东京:国会图书馆,1991年。
8. 《人物参考字典》四:《日本人名典据录》,两卷本;东京:1983年。

鲁惟一

1992年2月于葛兰彻斯特

(邢文译)

目 录

中译本序	1
序	1

《战国策》	1	《韩诗外传》	131
《潜夫论》	12	《汉书》	136
《九章算术》	17	《鹖冠子》	144
《周礼》	25	《孝经》	149
《周髀算经》	34	《新序》	162
《竹书纪年》	41	《新论》	167
《楚辞》	51	《新书》	170
《庄子》	60	《新语》	180
《春秋》及其三传	71	《荀子》	187
《春秋繁露》	81	《淮南子》	199
《中论》	92	《黄帝内经》	206
《尔雅》	99	《易经》	229
《法言》	105	《逸周书》	242
《风俗通义》	110	《仪礼》	247
《汉纪》	118	《管子》	258
《韩非子》	121	《公孙龙子》	267

《孔子家语》	273	《申子》	418
《国语》	279	《慎子》	424
《老子》	285	《史记》	430
《礼记》	310	《诗经》	440
《列子》	316	《释名》	449
《论衡》	328	《说文解字》	455
《论语》	333	《说苑》	470
《吕氏春秋》	344	《孙子兵法》	474
《孟子》	352	《大戴礼记》	484
《墨子》	357	《太玄经》	488
《穆天子传》	364	《独断》	496
《白虎通》	370	《东观汉纪》	501
《山海经》	380	《吴越春秋》	504
《商君书》	392	《盐铁论》	508
《尚书》	401	《晏子春秋》	515
《申鉴》	414	《越绝书》	523
附录一 篇目索引	527		
附录二 主要西文杂志译名表	528		
附录三 外国人名译名表	529		
附录四 西文文献篇目索引	538		
译者后记	578		

《战国策》

一、内容

所存无几的先秦文献中,《战国策》可能是唯一的处理战国时代所有诸侯国历史的文献。它包括了战争及政治操纵的故事,也关注着品评标志着中国历史从古代向新时代发生重大转变的那个时代的人物面貌。正像“春秋”一样,“战国”也用来指称一个历史时代(公元前 481 或前 403 至前 221)。此书的风格和内容独一无二,它树立了一个通过外交辞令来为强权政治的策略作辩解的先例。那机智的说服方法和游说者的生动形象、他们的睿智和幽默,使此书具有超过其历史价值的文学价值。

《战国策》关注的是利用阴谋来获得优势,这多少有点与儒家的道德准则相抵触。自它以今本形式编集成书开始,它就从未享受过其他古书在中国所享受的那种程度的尊敬。几乎所有儒家学者,包括它的最初编纂者刘向(公元前 79 - 前 8 年),都指责它的史学意蕴。刘向在他为此书作的序言中,抨击战国时期的统治者“损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其他学者虽不满此书的道德取向,可又被它优雅的修辞及磅礴的文风所吸引。陆陇其(1630 - 1693)的观点是,它就像“美食中的毒药”。这代表了对待《战国策》的传统态度,即既将它视作文学作品来欣赏,又将它视作历史著作来批判。

二、资料来源

关于书题的意义、此书的起源及本质,有不同观点。有些学者将“策”解释为“诡计”、“密谋”或“阴谋”;其他学者相信它应该是指书写所用的竹木简,因而是指“文献”。给出书名标题的刘向也清楚表明了他的观点。他写道,此书是“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这样,我们就很有理由采取刘向的原意而将书题释为“战国时代的计谋”。有些译本的题目意译为“密谋”或“诡计”等词。

关于此书的本质及风格,以及它应被视为历史还是被视作小说,一直聚讼不已。多数史籍及书目将它著录于杂史,但《宋史·艺文志》,第5203页其他一些书目则将它著录在纵横家。

据刘向记载,除了八篇不完整的记载各诸侯国事情的文献以外,他在秘府还发现了错乱杂糅的残篇。他将这些材料依国别分类、大致按年代先后编次,再用其他未经整理的文献增补,删去重复篇目,最后编定为33篇。根据刘向述及的当时的秘府中所保存的有书题的文献(即《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和《修书》),很显然他编辑《战国策》时至少使用了六种同样性质、同样范围的原始资料。这些文献今天都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根据它们的题目,可将其分作清楚的三类:

(一)各诸侯国的地方文献记载,包括《国策》和《国事》。两种书题的第一字都是“国”,所以,它们一定像《国语》那样是按国别编排的。它们显然属刘向提到的“有国别者八篇”那些材料。通行本《战国策》分周、七个诸侯秦、齐、楚、赵、魏、韩、燕和三个小诸侯宋、卫、中山等部分。这样,刘向明确提及的八篇似乎与周和七个主要诸侯有关,后三者仅占很少一部分。这些文献可能不是各诸侯的官方历史,因为人们已知的官方史书是编年体形式,且已毁于秦火;《国策》和《国事》更可能是各国编撰的与国家事务有关的其他

记载。

通观全书,各个段落,无论长短,一般记述一个独立事件,同前、后文所记事件无关。有一些故事与已经考定为真实的历史事实有关,它们可能采自诸侯的官方档案。例如,秦国部分的头几段记载,卫鞅(更以商鞅知名)去卫往秦,他在秦国进行了八年的改革,直到秦孝公死后他被车裂。这段记载与《史记》卷六十八相似。其他一些故事,如关于医生扁鹊、王孙贾、智伯或六国间政治联系的故事也可从《史记》或其他历史文献加以证实。

(二)轶事,如刘向定为《事语》的那些文献。它们可能是按话题分类、用话语形式记述的各诸侯的历史浪漫故事集。“语”这个词也见于书题《国语》,这是一部依国别编次的春秋轶事集。同样,《事语》一定是由战国时代同类材料组成的作品,苏秦和他由忠于支持秦的联盟转向忠于反秦联盟的故事可为例证。儒家的传统观点极不赞同这个故事的道德意蕴,但是,由于它的文学价值,它被认为是最好的历史浪漫故事。它的生动到甚至极度夸张的叙述可能出自人们传播的轶事,它们在各诸侯国之间逐渐演变成民间传说。《战国策》中的这些故事大多用极富想象力的话语形式写成,所以,有理由相信此类叙述的依据是轶事或上述《事语》。

(三)同外交家理论和实践相关的材料,包括《短长》、《长书》和《修书》,它们可能是根据辩论的类别编次的。词语“短长”(短和长、错和对、失和得或缺陷和优势)似乎是指争论中双方之间的对立论辩。它们所记的显然是某些外交家通过夸大了一方论点而贬抑另一方论点而表达案例的实践;或者,为了取悦某人而当面赞扬(长)并同时背后诋毁(短)别人。

有些学者认为,词语“短长”是指编写同一种文献时所用的长度不同的木简。实际上,人们并未发现这样用法的例证。况且,即使文献是写在长短不齐的木简上,也没有理由猜测这一词语就是特指外交文献。

那些被称为《长书》和《修书》的资料也许仅叙述了计谋的一个方面,否则它们所应该含有是更长的辩论记载。《战国策》中有特别富含不同外交家有关计谋或阴谋的论辩;较少故事、轶事或寓言;而可视为历史记载的段落几乎没有。很清楚,《战国策》是一部根据不同资料编纂的书;因此,它不能武断地归入单一的分类:历史类或小说类。

三、年代及作者

《战国策》所记事件的年代大体与刘向序所说相符。刘向说,此书涵盖春秋末至楚汉之兴 245 年间的历史。楚,作为帝国权力的争夺者,出现在公元前 209 年,向前推 245 年是公元前 454 年。除同卫灵公(公元前 534 - 前 493 年在位)相关的一件事外,它记述的所有事件都属于这个时代。一些学者认为,关于卫灵公的那段话是作为和上下文有关的引文插入的,不是作为春秋的一个独立事件载入《战国策》的。它的多数内容和战国中期相关,仅智伯故事的年代稍早,智伯的采邑在公元前 453 年被赵、魏、韩瓜分。

《战国策》所记最晚事件的年代约在公元前 221 年左右(例如在公元前 227 年那次不成功的行刺秦王,第二次企图行刺发生在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即皇帝位后)。既然它记载的最晚事件和公元前一世纪编纂成书之间有约 200 年的时间距离,因此,某些前汉时写的材料也有可能被收进此书。

自从唐朝学者把它的作者定为刘向以来,此书的作者问题长期受到质疑。《旧唐书·经籍志》,第 1993 - 1994 页书目有一注:它是刘向所撰;《新唐书·艺文志》,第 1463 页的书目中有一条是“刘向《战国策》”。顾广圻(1776 - 1835)甚至认为,《战国策》源于刘向本人的学派,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它会不同于韩非子、司马迁和其他学派的作品。由于序文清楚记载,它是刘向根据当时存在的不同的古代文献而校订、编次完成的一部书,所以,刘向是编者,而